

聚焦文学新力量

重新发现“真”与“美”

□行 超

如果说每个作家的成长都要经历漫长的挣扎和蜕变,那么,李修文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所面对与呈现的则是一种断裂。“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在生活中、在“人民”中,李修文反复修炼自己,他忏悔、反思,为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真情歌唱,最终脱胎换骨。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现场仿佛不合时宜,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警示、一种预言,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内心尘封已久的对“真善美”的向往,重新给予道德以洗礼,给予精神以力量。

重新成为一个作家

早期的李修文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的。他的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曾为他确立了一个文学世界中不错的开端,关于爱与死亡的探讨,关于情感的绵密书写,奠定并隐约透露出李修文个人的美学底蕴——一个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不过,这些在作家而立前后写就的作品,多少带有横冲直撞的痕迹。如同李修文自己所说,“我写不出小说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此后,李修文的创作经历了近10年的沉寂。

直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出现。一般来说,确凿的主人公抑或是人物,大多存在于小说中。散文的人物通常是叙述者本人或抒情的自我。然而,李修文的散文恰恰打破了这个习见的常规。看起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饱含着作者动人的叙述和强烈的自我抒情,但他所着力刻画以及最终留给读者的,永远是他作品中那个“他/她”。《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的老路、《鞑靼荒漠》中的莲生、《看苹果的下午》中的牛贩子、《郎对花,姐对花》中的“她”、《三过榆林》中的瞎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让李修文的散文完成了一部优秀小说所必修的功课。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的写作重新定义了散文。更重要的是,小说家李修文经由散文的创作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抑或是,他借此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作家。

当然,体裁与技巧的改变仅仅是李修文重新成为一个作家的起点,更为核心与重要的是,散文集《山河袈裟》以及之后的《三过榆林》《春天在哪里》等文中所呈现出的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已经与之前小说创作时期的他有本质的飞升。如果说,早期的李修文仅仅是一个颇具才华的小说家,那么,从《山河袈裟》开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树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学世界中的他重生了。

羞耻之心与悲悯情怀

《山河袈裟》的首篇《羞于说话之时》中,一对老夫妇在飞机上面对漫天的雪景时,不禁涌

李修文,1975年生,湖北人,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曾为报社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1996年起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不恰当的关系》《闲花落》《心都碎了》,散文集《山河袈裟》等。

重新发现“真”与“美”

□行 超

出泪来,老妇人的话让作家此后多年始终牢牢记在心——“这景色真实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在古典美学中,“害羞”是多么高贵的品格。正是因为“害羞”及其所带来的距离感、朦胧美,才有了那么多暧昧的、动人的瞬间。

“耻感文化”是东方文化重要的精神和美学。羞耻之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规约,但是根源却在于外界的评价。李修文所倡导“害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在面对天地之大美、人间之大爱、命运之无常时,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必须保持沉默,全身心地迎接生命的启示。“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害羞”所指向的是谦卑,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他人的充分尊重和完整领受,惟其如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真正平等和谐地与天地万物相处,一个人才有可能具有慈悲心肠和悲悯情怀。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下,李修文的写作朴实、冷静、克制,却具有一种磅礴的、沉郁顿挫的力量——这“沉”与“挫”正是作家李修文在不停的行走、不断的倾听与感受中积累起来的,这厚重来源于作家对具体生命的关切与体谅。李修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杜甫的热爱,“我最爱他植根于日常生活上的叙事能力,这个能力包含着一个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精神世界,简朴、专注、琐碎又饱含深情,既是写作本身,又是写作的结果,我觉得写诗的杜甫这个形象非常动人,这个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迷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杜甫背后,还有苏东坡这样很多很多的个体,他们全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和美学谱系。”李修文热爱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代表的杜甫,他在磨难中修行,在挫折中成长,以至于将天下、将万民装进心里,只有在这样的作家笔下,真正切肤贴骨又饱蘸深情的写作才有了可能。

有情所累此生

读李修文的文字,我常常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这个出身优越却命运动荡的“悲伤之王”,先后做过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推销员,最后成为一名钢铁厂工人,直到因工伤成为打包工人。赫拉巴尔称他笔下那些钢铁厂工人、废纸回收站职工、剧院布景工、保险公司职员、教堂看门人等是“底层的珍珠”,他们身上暗哑却持久的光泽,感动了作为写作者的他。

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他与现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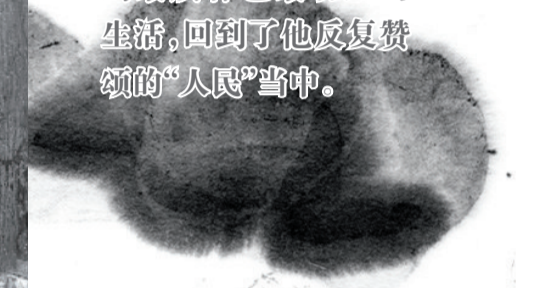


活、与平凡人的关系?李修文与赫拉巴尔一样,都选择了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真正跟他笔下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同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困窘、劫难以及微弱的希望:与瞎子一起走夜路,与绝症病人一起守夜,与打零工的弟兄们一起度过困厄的除夕夜……在真切的、富有力量感的现实生活中,李修文绝不扮演什么居高临下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底层的人们牢牢绑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风雨同行、休戚与共。

李修文说,“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和美”。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和美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修文在这两者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力量,找到了新的方向。比如,在雨夜的行程中,汽车遭遇故障,所有人不得不下车步行,就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场美丽的、与“人民”的相遇开始了——与一位艰难“践约”的盲艺人携手同行,让作者重新感受到信仰和精神的力量。面对生命中无数暗夜和波折,盲艺人始终告诉自己,“你就当它们全都不在,风也不在,雨也不在。”(《三过榆林》)这种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让他走过无数命运的沟沟坎坎。有什么理由不赞颂这样的平凡人?在这样的人们身上,难道不是孕育着最具力量的美?盲艺人的生命、他师父的人生,以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令李修文满怀深情,满心悲怆。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更看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

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



情。李修文的散文以情动人,这种真挚的抒情在当下散文写作中难能可贵。更多的时候,一些作家不是以零度的姿态描述生活,就是被泛滥的抒情所淹没,以至于显得矫情、虚伪。李修文的散文之所以感人,在他的笔下,“人民”、“美”,这些看起来很大的词汇,之所以并不显得空洞和轻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文、为人所秉持的真诚与诚恳的态度,也正因如此,我们能感到,李修文的笔沉重、踏实,同时时刻紧张而节制。他始终将自我放在“人民”之后的写作立场,最终赋予他的散文一种字字珠玑、字字血泪的分量感。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艳羡李修文的经历,那些颠沛流离中的偶然相遇渐渐氤氲成他写作的素材和底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我感慨于李修文的勇气,更感动于他的真挚和纯粹。在今天,重谈写作的道德感是否显得过于守旧、迂腐?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是不是还存在一种相对确切的“真”与“美”?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李修文笃定的创作观与从容的笔墨让我们重新相信,一流的写作到最后拼的绝不仅仅是技法。如果确如福楼拜所言,“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那么,在这“才能”之上,我想,灵魂的深度、内心的豁达,抑或是人格本身,则显示了一个作家最后的精神标高。

■创作谈

有一年,我和诗人叶舟结伴,去看一座北魏石窟,其时,蒙蒙春雨洒洒着窟外的麦田,窟内的大佛却像真理一般高聳无言,巨大的雾气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混沌不清,但是,一阵丧乐和接连的哭声却清晰地穿透雾气,来到了我的耳边——好像是一场神的教诲,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耳边不是他物,正是我的山河人间,如此山河人间。曾被杜甫目睹,曾被李白踏破,它当然也值得我为之号咷俯首,那些春雨,麦田和雾气,那些大佛、丧乐和哭声,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我决心以后不再写别的,就写埋藏在其中的美与劳苦。

行旅不止,一个更广大和泥沙俱下的人间在我身前依次展开,踏足山东山西,身逢离乱残疾,某种巨大的眷恋足以使我再三确认自己的命运,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要为我看见的“真实”而写作吗?在陕西潼关,当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人带领着我,再三向我指认他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我不应当只是记录他,相反,我甚至要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去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也许我可以这么武断地说:如果我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应当是所谓的“真实”,而应当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

所以,我怀疑,前人们既定的某种真实之感,极有可能对真正的真实造成了混淆,今日里最大的真实,恰恰可能是某种不真实:就像战胜了许多围棋高手的阿尔法狗,它的内心如何描述?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尺度上去触及它处境与内心的真实?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越来越需要故事化的暗示进行生活时,也许可以这么说:是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个杀猪卖肉之徒,照样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且愿意像他们那样进行故事化的创业,幻觉已经笼罩了他,然而,他就是今日人民中的一员,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诚实地写下这些变化中的人民,这里同样埋藏着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美与劳苦。

是的,我还是说到了“人民”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字,它让我觉得光明而堂堂正正,于我而言,人民不是别人,正是穷途末路上遇见的那些沦落人,正是他们,才为我别造了一座崭新的人间,在此处,我所获取的安慰,等同于写作之初博尔赫斯、里尔克给我的安慰;在此处,我愿意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个文人。于是,上天自有安排,在“人民”浮现之后,我触碰到了一个终生愿意去触碰的词汇,情义。

在我的人间,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情义”,似乎难以被任何一种现代性修辞所解释,对于许多怀抱大师情结的人来说,解释它甚至是羞耻的,是啊,它既不能证明纽约郊外的中产阶级失落,又不能证明《小城畸人》式的工业社会之畸零情形,可是,于我而言,这却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工厂里的务工青年仍然在桃园三结义,来自湖北的泰春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自己究竟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如此等等,依我看来,其实是中国入最初的模样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行进,我得紧盯它们、认领它们,如此,我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

也许,我夸大和矫饰了我所安营扎寨的地方,所以,诚恳是多么重要啊,在我的人间,我决心变得简朴起来,像杜甫和《古诗十九首》一样简朴:字就是字,词就是词,相信遣际,接受命运。朱熹有云,作文一途,无非“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继续在山河人烟里打转,所谓“实”,就是以己之躯,去寻觅、去校正那些命中注定的词汇,惟其如此,我的人间才能让我继续写作,继续实践我一再告诫过自己的话——面对写作,不要想得太多,我要写的无非只有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018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在京开班

本报讯 8月20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主办的“2018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班。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41名出版翻译界代表和汉学家齐聚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研修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浙江省作协主席麦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肖丽媛等出席了开班仪式。

朱琦在致辞中表示,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是为加强国际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的沟通与合作,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互鉴传播,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而设立的官方研修项目。研修班以文学出版为基,以翻译合作为桥,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学出版作品译介合作。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未来更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努力加强中外文化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希望各国出版翻译界代表和汉学家能深化合作交流,打造文学出版翻译精品,用文化译介架起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

麦家表示,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令自己内心变得宽广,也热爱上了文学,更加想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生命的魅力,由此开始创作,同时,也正得益于翻译家的工作,自己的小说才走向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可以说,翻译家拓展了作家的文学生命。

开班仪式上,赵海云、黄友义、肖丽媛以及阅文集团起点国际运营总监刘昱人分别从文学翻译、出版交流以及网络文学发展的角度介绍了近年来中外文学翻译出版交流的情况。麦家以讲故事的形式与参会嘉宾分享了自己对语言、文学和翻译力量的感悟。2015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获奖人、缅甸翻译家杜光民,波兰翻译家马乌戈热塔·雷利加、伊朗翻译家孟娜代表研修班学员交流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心得体会。

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活动于2015年开始,至今已举办四届。此次研修班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将与余华、盛可以、阿乙、马伯庸等作家、学者共话,并将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数据库发布会、国际童书翻译出版研讨会、国内出版机构路演、“一带一路”倡议下汉学家翻译作品交流等活动。

主旋律更加响亮 正能量更加强劲

□本报评论员

时代潮涌,万象更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持续做大做强理论舆论,厚植厚培文化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主流思想舆论持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得到极大彰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更加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加突显,主旋律越来越响亮,正能量越来越强劲。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文艺创作进一步繁荣,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日益洪亮。

国运兴则文化兴,文化强则民族强。5年多来,文学界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用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服务壮阔的改革开放,助力火热的经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反映现实生活,把充满激情的文学创作融入到记录人民昂扬奋进的事业中去,讴歌伟大时代,刻画美好心灵,以多样化创作展现新时代生动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生活、引领时代风气,给人启迪和美感优秀作品,持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有原则、有锋芒的文学批评有力引领创作,高素质文学人才持续涌现。对外文学交流生动活泼,当代文学精品走出去步伐加快,当代文学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国文学正在成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



(上接第1版)新世纪以来,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文学积极应对挑战,守正创新,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形态发展迅速,文学活力进一步迸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勇担使命、砥砺前行,正在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在脱贫攻坚战的现场,在深化改革的最前沿,在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活跃着当代作家的身影。今年的“中国作家馆”聚焦“中国文学与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为了全面总结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全景展现中国文学40年的辉煌成就,向辛勤耕耘、勇于创造的广大作家致敬,向热爱文学、关心支持中国文学的广大读者致敬,让文学走进读者,让读者走进文学。

仪式上,扎西达娃代表西藏作家将此次参展的精品图书赠送给“中国作家馆”。他在致辞中说,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西藏当代文学不断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作家们植根于高原文化沃土,不断融入我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潮流,创作上结出了累累硕果。在这个历程中,涌现了益希单增、丹增、汪承栋、朗顿·班觉、马原、色波、马丽华、加央西热、央珍、吉米平阶、次仁罗布、扎西班典、尼玛潘多、罗布次仁、旦巴亚尔杰、次仁央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西藏的地域文化,叠加着西藏在守土固疆、扶贫攻坚、改善民生、生态保护等各个领域的伟大成就,叠加着各行各业建设者们克服高寒缺氧为这片土地不懈奋斗的动人故事,叠加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的时代篇章,西藏的作家、西藏的文学是大有可为的。相信西藏作家们通过不断拓展文化视野、提升文化自信、

树立文化自觉,一定能使西藏的文学创作迈入新征程、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与经典相遇,向文学致敬”——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出版启动仪式。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白桦、许晨、弋舟,作家出版社社长扈文建、编辑秦悦,青年评论家李壮参加活动,用手中的拼图共同拼成新书封面模型,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分享。据悉,该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办单位之一,中国作协一直积极参与组委会工作,精心推荐重点图书参展,组织精彩文学活动,全方位多样化呈现文学魅力。自2010年起每年设立的“中国作家馆”始终致力于展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促进全民阅读、实现中外作家交流对话、活跃国际图书版权贸易,主题鲜明、活动丰富,既是北京国博会颇具特色、广受青睐的展馆,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今年展馆面积180平方米,展出内容共分四个板块:“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展区以新时期、新探索、新世纪、新时代为主线,集中回顾了中国文学4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丰厚积淀;“弘扬民族精神,繁荣西藏文艺”展区呈现了西藏文学的发展成就和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精品图书展区”推介了近年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各种畅销书、长销书和新版书;“文学期刊展区”展示了中国作协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旗下的优质文学刊物。

本届国博会期间,“中国作家馆”还将举办西藏作家作品签赠会、中国作家网驻站作家作品分享会、“现实主义与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主题论坛、《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发布及分享会、周晓枫首部童话《小翅膀》新书发布会、《英雄格萨尔》新书分享会、《戊戌变法》新书分享会等多项活动。